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4.018

## ■ 文史研究

# 范式转换与批评史学科重构<sup>①</sup>

——试探以关键词为纲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

胡红梅<sup>1,2</sup>, 胡晓林<sup>3</sup>

(1.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3. 湘潭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研组, 湖南 湘潭 411228)

**摘要:**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以时间为线索对过去的文学批评进行梳理,以体现撰史者的社会立场、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在新世纪的文论生态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应突破传统的著述体例,借鉴雷蒙·威廉斯开创的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词批评”的研究范式,以理性思考学科性质为始基、以对学科发展的全景扫描为门径、以勾稽爬梳关键词为中轴来探索以关键词为纲重新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样,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精髓和逻辑演进脉络,从而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范畴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关键词:**中国文学批评史;关键词;学科建构;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4-0113-07

##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Discipline Reconstruction of Criticism History: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the Keywords as the Key Link

HU Hong-mei<sup>1,2</sup> & HU Xiao-lin<sup>3</sup>

(1. School of Humane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3. English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Xiangtan Count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of Hunan Province, Xiangtan 411228,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combed the past literary criticism chronologically,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writer’s social position, culture idea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n the new century’s literary ecology,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writing style, and fully make use of Raymond Williams’ research paradigm by explaining the core terms to reflect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eywords criticism”. With the rational thinking on disciplinary nature as the primordium, with the panoramic scanning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s the source, and with the keywords sorting as the axis, it explores to the necess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writing the

① 收稿日期:2014-01-15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基地”项目([湘教通(2004)284号]);2012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哲社领[2012]14号);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3C299)

作者简介:胡红梅(1975-),女,湖南湘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keywords as the key link.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on the whole, grasp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category system.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几乎所有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发展历程的论著,首先都把学术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但从当前学界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及相关研究著述来看,编撰者和研究者在理论认识和研究视野上大都不能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现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在编撰体例上或以时代为界,或以问题为纲,或以批评家标目,或以文体为序,未能突破以往批评史的撰写框架,从而严重制约了本学科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要想在 21 世纪开创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局面,解决制约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谋取更久远的发展和更强劲的生命力,就必须引入新的理念和方法以开创一种新的研究格局和气象。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一书中运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研究文化关键词,通过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这种“关键词批评”的全新观念、视角和方法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在取法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以理性思考学科性质为始基、以对学科发展的全景扫描为门径、以勾稽爬梳关键词为中轴来探索以关键词为纲重新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 一 学科性质的理性思考

一个以“史”为题的研究与撰写,其基本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都应落在对其学科性质、特点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上。因此,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和撰写者,首先必须以一种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考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性质。

一门学科的学科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那么,中国文学批评史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是什么?“文学批评史以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是对文学批评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研究范围涉及到‘文学批评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文学批评’,故其以‘史’为纲,以文学批评为目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文学批评史料的调查、考证、分析、比较、综合、归纳,从纵的方面去探讨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及其规律性,并适当从横的方面进行批评家、批评流派、批评理论以及中西文学批评实践的比较研究,以寻求各自之间的异同及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sup>[1]37</sup>由此看来,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即侧重于对“史”的真实描述,与此同时也将“历史上的文学批评”纳入其研究视野并以一种现代眼光进行科学的、理性的还原,尽量使其呈现本来面目。所谓“史”的研究是以历史的维度对问题的发生发展、源流演变进行纵向考察与描述。所以客观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即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也就是指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具体历史过程,或者说以历史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批评。

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sup>[2]467</sup>,而“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sup>[2]533</sup>。列宁也说过:“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sup>[3]118</sup>“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sup>[4]78</sup>,由此可知,术语、概念和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都是由一系列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关键词构成,有着专属自己的概念、范畴和关键词系

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也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或学科,是由一系列的术语、概念、范畴构成,并且通过这些术语、概念、范畴构成的一个网络体系来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因此,所谓“批评史”不仅仅是关于文学批评的一般的历史,还应该是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因而也是关于“关键词”的历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其学科范畴和关键词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过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范畴和关键词的逻辑发展,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科学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是建构一门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石。只有通过对该学科关键词的清理、激活、重构与创造,才能推动本学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关键词是构成本学科的最基本的细胞体,它作为人类认识文学现实的纽结、环节和梯级,是对学科发展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通向深广的学术研究之津梁。首先,关键词是具有很强建构能力并能以此为词根衍生出一系列概念和范畴的“强力语词”。某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关键词可以看作是描绘该时期本学科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基本蓝图,因此掌握一时期文论之关键词可以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正如南帆所说:“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隐含了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信息的关键性概念,这些关键性概念在特定文化网络之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并成为复杂的历史脉络的聚合之处。在很大程度上,阐释这些概念也就是从某一方面阐释一个时代。”<sup>[5]1-2</sup>其次,关键词是理论家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文学现象中总结提炼出来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检验与确证的核心范畴。它们不是理论家主观臆测或杜撰的产物,而是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文学现象中总结提炼出来并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具有理论规范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核心范畴。再次,关键词作为人类言说的主要话语载体,不仅包孕着由个人与社会共同赋予的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积淀着大量社会与时代的信息。它们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它们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化规律。因此,关键词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思维的“纽结”,而且也是本学科知识赖以系统化、科学化的“纽结”。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关键词”的研究,就可以系统考察不同时代各具特色的理论流派及理论家们的思维路径和思想精髓,揭示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范畴、关键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在把握本学科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反思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文学批评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关键词,其数量之丰富、涵义之深刻,绝对不会逊色于西方文论。这些概念、范畴和关键词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历代理论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它们既是历代文论家们对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他们用以进行文学批评鉴赏的有效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一部文论范畴、关键词的演变史。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集中地反映在富有理论思维特色的范畴及其体系之中。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考察,可以看出,范畴研究尤其是关键词研究是批评史学科建构和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理论工程,然而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内至今尚没有一部完全按关键词体系编撰的批评史问世。

## 二 学科发展的全景扫描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可以看到从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基伊始,几代批评史的专家学者们经过近百年的辛勤耕耘,他们不仅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概念范畴的厘定与阐释,而且在脉络体系的清理与建构等方面都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收获最多、成绩最大的一个领域。单就著述形态的批评史研究而言,20世纪先后出现过两个高峰时期:其一是三四十年代前后,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为代表的批评史名家的著作纷纷出版,他们初步划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疆域版图,构筑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体框架,从而确立了本学科研究的基本景观。其二是80年代以来,王运熙、顾易生和张少康等人的批评史著作后出转精,在穷搜博采批评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样的阐释

方法和研究手段,初步实现了“史”与“论”的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与这种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缺乏对学科特性的深刻自省和反思意识。

文学批评史研究必须以严格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去对文献资料进行发掘和考辨。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先生的研究不断邃密深沉,别树一格。这与他们学养深厚、在文献领域不断拓展、不断发掘密切相关。他们在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力摒主观臆测,通过对文献材料的爬梳和考辨,还原批评史的基本史实,从而弄清各个时期批评家的审美趣尚和理论主张,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的潜进理路和发展脉络。这才成就了他们在这一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名望。然而,我们作为新一代批评史的研究者或撰写者,如果仍然像他们那样单靠资料的发掘和积累显然是不够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假如我们的眼光仅集中于个别理论家或某一时段的重要著作,而缺乏一种创造性的、整体性的思维,那么以后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作简单的重复,意义十分有限。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和撰写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文化观念、社会立场等方面价值观对过去的文学批评按照时间线索加以梳理,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对批评家及其提出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等作简单排列。撰写者在考察和分析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批评理论观点时决不能就事论事,而应将其置于广阔的背景上,由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从多层次、多角度甚至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予以审视和阐释,特别要重视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创作实践的结合。

每一时代的文学思潮大多是由不同文论流派的文艺思想交汇而成,而每一文论流派又必定会有概括和彰显其文学主张的核心范畴。比如说,研究先秦时期的文论思潮,就可以通过考察先秦时期概括和反映儒、道两家文艺观的基本范畴和核心关键词来把握这一时期这两个不同文论流派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历程。他们提出的“道”、“气”、“兴”、“象”、“和”等关键词就是最能反映和概括这一时期文论思潮的核心范畴。通过考察它们如何从哲学范畴逐步地发展为美学、文论的中心范畴,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构成这些中心范畴的具体质素,把握其理论形态的日趋完善的过程,这样就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文论思潮性质和特点。因此,要实现古代文论的激活创新与现代转换,就必须返回到先秦文化元典中去。只有通过先秦文论经典文本的重新释读,才能返回到古代文论的原初形态和历史情境中去,才能寻找新的理论视野和理论生长点。

考察一个文论流派的嬗变过程可以从探寻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核心范畴及其范畴群入手。儒家学派统治文坛两千多年之久,从孔子到朱熹、王阳明等,这期间出现了很多重要概念、范畴和关键词,有的贯穿着整个流派的发展始终,有的则受时代、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影响其内涵发生了嬗变衍生。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概念、范畴和关键词逐一进行还原和阐释,探寻其丰富复杂的生成背景和文化语境,在还原知识范型原貌的基础上发掘其理论谱系,而不把它们作为凿枘客观史实的模式,那么我们就更清晰地透视儒家学派的本真面目及其“理论旅行”图景。

范畴与文体关系密切,每一文体有其独特的范畴。诗歌是中国古人常用的文体样式,自先秦以来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同时他们对诗歌的关注也最多最持久,因此,关涉诗体的概念、范畴和关键词也最为丰富成熟,中国诗学史的逻辑演变轨迹可以通过对一些基本范畴的分析使之凸现出来。比如陈良运先生的《中国诗学体系论》通过对“志”、“情”、“象”、“境”、“神”五个核心范畴的研究,提出中国诗学发端于“志”,演进于“情”、“象”,臻之于“境”,最终升华或凝结于“神”的结论。他把这五个核心范畴联结起来,将它们拓展深化为五个诗学基本理论命题,即“言志”、“缘情”、“立象”、“创境”与“入神”五个部分,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从而阐明中国诗学之发展的基本历程,并以此为核心建构了一个诗学体系。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发展过程中,范畴研究方兴未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批评史范畴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它们各具特色,或者是个案研究和个别范畴系列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如蔡钟翔主编《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浦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涂光社著《庄子范畴心解》,杜磊《古代文论“韵”范畴研

究》、胡建次《中国古代文论“趣”范畴研究》等;或者是综合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如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薛富兴《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等,然而这些著述较少关注范畴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变异性及其共联关系。虽有赵沛霖的《兴的源起》、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等仅限于对个别关键词或某一文体的研究,还有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胡经之的《中国古典文艺学》、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等的可贵尝试,它们虽不以“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范畴研究”为名,但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若干范畴的研究。这些著作或以西方的理论体系来裁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史实,或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几大主要范畴的梳理与阐释,仍未能突破传统文论范畴研究的偏狭视域,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既从纵向上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面貌,又从横向上透视各历史时期文论思潮律动的特点,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论之精髓和理性线索。

因此,我们应立足于更高层次,不断开拓研究视野,转换研究范式。在精准的描述、厘定与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史实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文学批评史各概念、范畴和关键词传承演变的轨迹及其共联关系,从而发掘其隐在的内核与基本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开拓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进行创造性研究,从而给当代人反思传统和开创未来提供一点启示,为新世纪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三 学科建构的范式转换

英国文化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中使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研究文化“关键词”,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其演变,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与“现在”意蕴,肯定过去与现在的“共联关系”,而且重视“关键词”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以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断裂、转移与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强调“关键词”的开放性与流变性,重视其源起、生成语境、理论蕴涵及其在批评实践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异。该书在体例上,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和文论史,或以时代为线索,或以批评家标目,或以问题为纲,或以文体为序等传统编撰模式。他采用的是按音序编排的辞典式撰写体例,在阐释每一个“关键词”时尽量呈现出其源起与流变,揭示其生成语境和变形图景,但在对词义的探源溯流和精准辨析之中却隐晦地表达了雷蒙·威廉斯的个人立场与批评观念,从而使这种阐释不仅具有传统阐释模式所不具备的文论性质,而且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李圣传在研究“文化诗学”时也采用了雷蒙·威廉斯的这种研究方法,来考论“文化诗学”的流变<sup>[6]</sup>。

一个词语如同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它的意义并非仅限于辞典意义,而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语境的改变而发生裂变。雷蒙·威廉斯提出的“关键词批评”就是“对一连串的词汇下注解,并且分析某些词汇形塑的过程……”<sup>[7]</sup>,正是通过“历史语义学”方法来探寻“关键词”意义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的形塑过程及其嬗变规律,揭示其间隐匿的意义差异、断裂和张力。这种通过阐释“关键词”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和方法,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路径和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对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关键词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如安德鲁·本尼特等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等。此外,还出现了“批评新成语”、“批评思想家系列”与“劳特里奇关键词系列”之类的系列丛书。这个时期的关键词研究重点在通过透视文学、文化活动,揭示各类文学、文化问题的生成语境和变形图景,呈现出对文学、文化理论的多元探讨和现代阐释<sup>[8]</sup>。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掀起“关键词”的热潮。先是《外国文学》《南方文坛》等刊物开辟了“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关键词解析”等“关键词批评”专栏。继之是出现了多种与“关键词批评”有关的出版物和译介国外有关“关键词”研究的专书。出版物如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赵一凡等主编的

《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周宪等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关键词丛书”等。译介方面刘建基翻译了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张卫东等翻译了安德鲁·本尼特等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汪正龙等翻译了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此外,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相关项目有:胡亚敏《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2007)、盖生《中国20世纪文学原理关键词论要》(2010)、赖彧煌《新诗观念史上的关键词谱系研究》(2011)、黄擎《“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在中国的批评实践研究》(2011)、李建中《中华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2012)等。“关键词批评”的开创者和推进者通过丰富的批评实践和审慎的学理思考所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批评理念和阐释范式,冲击着传统的批评话语和阐释模式,显示了强劲的理论穿透力。但总的来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研究还只是处于开创阶段,尚未得到长足发展。

近年来关键词研究已经成为学界最热衷的研究范式之一。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相对稳定的系列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衡量该学科是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某一学科在某一时期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不断更新和丰富的关键词体现出来。因此,从关键词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问题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反思视角。透过关键词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方面,通过甄别遴选那些起核心作用的关键词,从语言学角度洞察这些核心语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中发生的意义衍生嬗变,通过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历时与共时有效兼顾的研究方式,才能科学认识这些关键词的全部内涵,从而更好地把握批评史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发展趋势,并借此反思该学科发展的脉流及瓶颈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关键词的历史还原与现代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建构该学科的关键词体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特色,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进而促进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体系的现代转型与重构。

丹尼尔·贝尔曾提出“中轴原理”的理论,他认为“中轴原理”是了解某一思想体系的基本坐标,他说:“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都在它们的论述中含蓄地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构的思想……”<sup>[9]</sup><sup>14</sup>他所说的“中轴原理”就相当于本文所说的“关键词”,把握“关键词”实际上也就是掌握某一理论系统的“中轴原理”。张荣翼根据这一论断指出:“在文学史述录中,不同的‘中轴原理’决定着文学史述史秩序的不同类型。”<sup>[10]</sup>

文学活动如同一个经纬交织的网络,那些核心的、具有关键作用的批评概念和范畴就是这个纵横交错的网络经纬线相交处的“网结”。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如若以勾稽爬梳关键词作为“中轴原理”,打破分科治学的模式导致对研究对象的切割,采用威廉斯“历史语义学”跨学科视域和路径,从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美学、文艺学等多学科视域,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内涵、文化要义和思想精髓。同时,打破“辞典-类书-范畴”的传统阐释模式可能导致关键词释义的静态化、非语境化以及历史语义场的缺失,运用关键词阐释的“生命历程法”的全新范式、思路和方法以达到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史实的洞穿和超越。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深层次挖掘中国文学批评史关键词丰富的文化哲学美学内涵,揭示中国文论发展的内在脉络、逻辑和基本规律<sup>[11]</sup>。

蔡锺翔先生曾在《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的序言中说:“一部美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学范畴发展史。”<sup>[12]</sup><sup>1</sup>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发展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关键词”是指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具有强大生发能力和辐射效应,最核心的、使用频率最高因而具有历史坐标性质的理论范畴。以关键词为纲结撰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关键词的选择问题,即如何从众多的古代文论范畴中挑选出最核心的、使用频率最高且最重要的理论范畴。关键词的选择与论者写作动机密不可分。刘勰精雕文龙时所采用的面向当

下、面向问题、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敷理举统的研究范式和深层的理论思维方式,对关键词及文学理论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是当代批评史研究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朱自清先生曾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sup>[13]188</sup>他所说的“批评的意念”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批评概念、范畴或关键词,他认为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应以文论概念、范畴或关键词的考释为基础。我们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和撰写者,要将理论与文本阐释有机结合起来,要在文化还原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释义。我们要甄别遴选出中国文学批评史当中那些起到核心作用的关键词(如:道、气、象等),打破以往文论研究者过分拘泥于对词义进行繁复的训诂考证的传统,从词源学角度追溯这些关键词在历史发展和批评实践中的生成源起及其衍生嬗变的轨迹,探寻这些核心语汇被遮蔽的边缘意义,并进而判发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活力和影响力,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例如,对中国文学批评关键词“气”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语言角度深入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及其历史演进的过程,探寻“气”如何从一个一般性的物质概念跃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最后演变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但是我们要跳出词源学的窠臼,运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探寻关键词“气”的历史源头及它们的形塑过程,发掘其意义的变异性及其共联关系,从而在审辨反思中推动批评史学科的建构和深入发展。

总之,作为新世纪的研究者,如果想要达到对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本质理解,要把握并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就必须摒弃既有的思维模式,借鉴全新的研究范式,努力站在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学思维的制高点,以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去审视对象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知解。面对于古代文论浩瀚的文化原典,不仅要通过钩稽、爬梳文献资料中那些蕴含巨大理论容量、关系学科命脉的核心范畴和关键词,而且要严谨辨识其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批评实践过程中意义的生成和演变的轨迹。只有从“关键词”角度去审视批评史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呈现该学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知识范型以及这些关键词的历史生成与文化语境,并尽力勾画出它们的理论谱系及其知识图景的原貌,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真实,真正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在精髓及其理性线索;才能深入体认古人所独有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和生存样态,真正揭示蕴藏在古人论说中的丰富意旨并将之贡献给更广大的读者。

#### 参考文献:

- [1] 蔡镇楚.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9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列宁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4]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 南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关键词[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 [6] 李圣传.“文化诗学”流变考论[J]. 天府新论,2012(5):142-145.
- [7] (英)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M]. 刘建基,译.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5.
- [8] 辛雅敏. 文学批评的改造与独立——从艾·阿·瑞恰兹到诺斯罗普·弗莱[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4-99.
- [9]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0] 张荣翼. 文学史的述史秩序:原型、经典和进化[J]. 齐鲁学刊,1999(1):66-71.
- [11] 任媛,曾思艺. 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88-92.
- [12] 蔡锺翔.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 [13] 朱自清.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